

# 近代上海的咖啡馆：公共空间与都市现代性

江文君

**摘要：**近代上海的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的涌现，展现了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大众”(mass, 群众)的登场。甚而可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公共性的不同发展路径。咖啡馆等新型公共休闲空间的涌现，为上海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与日常公共性的展示舞台。凭借这类公共空间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人们荡涤往昔的陈见，更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城市生活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启蒙式的更为敏锐、更为灵通的公众舆论。

**关键词：** 咖啡馆；公共空间；现代性

**作者简介：** 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235

有一句谚语说：“咖啡馆是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场所。”在历史上咖啡馆更多的呈现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哈贝马斯的讨论中，咖啡馆正是公共领域的具象体现。<sup>1</sup>在30年代上海文人的笔下（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等），咖啡馆更多的被赋予了想象西方的价值，“咖啡店的确是现代生活之一大象征，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杰作”。<sup>2</sup>一方面上海的咖啡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表征。中产阶级分子们可以在这里轻松地交换主张，参与政治性辩论，知识分子们在这里可以集体参与改进中国社会及民族救亡的谋划。位于上海租界内的咖啡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西方公共领域的想象，这恰恰与“五四”运动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热切期望不谋而合。在进入这类新型公共空间的时候，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经验和这种公共空间所内含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都被淡化乃至遮蔽。然而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的公共空间在很多时候是一小群人的集会，其内部是平等开放的，不受身份、地位、出身的限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加入的资格，这些空间往往要求参加者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并且受过良好教育。这是一个沟通的领域、交谈的场合，而且是公开的、一般人即可参与的，在都市广泛存在的社交场合。咖啡馆以及各种娱乐场所的出现使得思想的碰撞和传播成为可能，由此“公众”的概念初步形成。仿佛如咖啡馆在西方18世纪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一般，只不过在18世纪时候的伦敦，咖啡馆是一个“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进入‘咖啡社交圈’”。<sup>3</sup>正如英国史学家蕾欧诺尔·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在《家庭财富：1780-1850年间英国中产阶层的男人与女人》一书中所指出的，“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会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成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sup>4</sup>

<sup>1</sup> 关于近代上海咖啡馆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论文加以探讨论述，譬如，Laikwan Pang（彭丽君），“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e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no. 1 (March 2006): 24-42. 胡悦晗：《茶社、酒楼与咖啡馆：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休闲生活(1927—1937)》，《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王琮、王军珂：《咖啡馆：上海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粤海风》2006年第4期；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上海摩登、文学现代性和殖民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尤其聚焦于知识分子与咖啡馆的复杂关系。对于作为公共空间甚至公共领域的咖啡馆，以及咖啡馆与市民大众、现代生活方式、公众观念的塑造之间关系，则缺乏关注，本文试图从这些领域加以探讨论述。

<sup>2</sup> 悟：《咖啡店中的女侍》，《申报》1928年8月20日，第30版。

<sup>3</sup>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1989, p.33.

<sup>4</sup> Davidoff, Leonore,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 一 咖啡馆：现代生活方式的展示场所

在上海，去咖啡馆喝咖啡这种休闲方式盛行于法租界，咖啡馆也主要分布于法租界霞飞路。这里与布满摩天大楼和百货公司、散发着商业气息的公共租界不同，处处展示的是法国的文化情调。此外，上海的咖啡馆不仅有法国情调的，还有意大利和俄国情调的咖啡馆，北四川路也是咖啡馆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咖啡馆有白俄开设的，也有日本人开设的。尤其日本人开设的咖啡馆的布置颇有特色，张挂和式年红灯笼，侍者均操日语，这是曾经东渡扶桑的留学生们爱去的地方。

咖啡馆的流行，一面展现了异国风情，一面也在新建的娱乐场所中呈现了想象力。同电影和汽车一样，咖啡馆也是一种现代性象征，一种闪烁着法兰西艺术魅力、精致的现代性。公共租界的联邦（Federal）咖啡馆和霞飞路上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咖啡馆以及其他档次稍低一点的咖啡馆，在1930年前后遇到了豪华的卡迪尔（Theophile Gautier）和雷尼尔（Henride Regnier）咖啡馆的激烈竞争。咖啡馆很受从日本回来的作家青睐，因为咖啡馆在日本早已普及，咖啡文明由于《咖啡座谈》和《咖啡店之一夜》等作品而闻名。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咖啡馆让茶馆失去了魅力。但在老城和工人聚居区，甚至就在租界，茶馆依旧是人来人往的地方。<sup>5</sup>

上海的咖啡馆的确是其融合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薛理勇的考证，中国最早记载咖啡的历史文献可追溯至1887年的《申江百咏》，其中一段竹枝词描写了西方餐馆在客人用过主菜之后，向他们奉上咖啡。<sup>6</sup>早期上海对咖啡的翻译至少有五种译法或写法：“磕肥”，“高馥”、珈琲、考非、咖啡。其中将咖啡翻译成“磕肥”和“高馥”等词在晚清的小说中时有出现。而“珈琲”一词则不是从译音而来，而是从日语借用过来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多家日本的咖啡馆，店名就写着珈琲二字。<sup>7</sup>在洋行中任职员的上海人也随西人之饮食习惯，吃起了西餐，喝起了咖啡。上海的洋行职员初喝咖啡，很不习惯其苦涩之味，喻之为喝咳嗽药水。很多早期的西餐馆都提供咖啡馆，如沙利文、凯司令等，但真正营业性的咖啡馆出现较晚。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尚无单独的咖啡馆记载，只是在介绍西式菜肴时，包含咖啡在内，当时不叫咖啡，而称为“加非”。<sup>8</sup>1918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上有西餐馆35家，而咖啡馆仅一家，1920年以后咖啡馆才较普遍。<sup>9</sup>咖啡馆日渐风行起来，以至于1917年黄楚九兴建大世界之时，都不忘在大世界屋顶上特设立一个咖啡厅。大致到了20年代末，咖啡店俨然已成了一种时髦事物。约朋友一起一边喝茶或喝咖啡，一边进行思想交流，甚至只是消磨时光，业已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休闲方式。1920年代始大量涌现的咖啡馆：霞飞路上的DD'S、文艺复兴、巴尔干、特卡琴科、君士坦丁堡、伟多利，南京路上的沙利文，静安寺路上的沙利文分店、DD'S C a f e、飞达、凯司令、皇家，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巴塞龙那、赛维纳、立德尔，

---

1780-1850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416.

<sup>5</sup>（法）白吉尔著：《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sup>6</sup>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sup>7</sup>余之：《摩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sup>8</sup>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1909年版，酒店一第6页。另有一说法，到1886年，公共租界（今虹口区）出现了一家独立营业的咖啡馆，即“虹口咖啡馆”主要对航海人员开放。这家咖啡馆不仅供应咖啡，还出售黄啤酒及黑啤酒，但不卖烈性酒或其他含有酒精的饮料。

<sup>9</sup>石磊、楚焰辉：《老上海侨民生活》，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北四川路上的公啡、上海珈等，多以其精雅的布置和浓郁的欧陆风情吸引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光顾。到了40年代，咖啡馆的经营形式更趋于多样化。据1946年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当时可以饮到咖啡的地方不下500家。”<sup>10</sup>

咖啡馆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地方，“DDS或沙利文巧克力店的咖啡是两杯1元多，蛋糕则更贵，约5元”<sup>11</sup>另有数据显示，1930年代，咖啡一般的价格在2角—7角5分之间，租界里的娱乐场所更贵。<sup>12</sup>张爱玲在《双声》中，描述她与炎樱逛街买鞋后到咖啡馆歇脚时，这样说道，“在咖啡馆里，每个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要一份奶油”。<sup>13</sup>

评论家黄震耀在一篇名为《我们底上海》的文章中认为，当时上海的咖啡馆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及虹口（日本人聚居区）这两个地区。其中法租界内的咖啡馆主要集中在霞飞路上。在霞飞路上，不同的咖啡馆有不同的氛围，如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巴赛龙那”和“塞维尔”充满了西班牙情调。一些无国籍侨民喜欢上巴赛龙那，除了喝咖啡，再有就是搞几本真真假假的护照。<sup>14</sup>的的斯（DD'S也有个亲切的译法——弟弟斯）、卡夫卡斯（Kavkas）、文艺复兴（Renaissance）、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是其中最著名的4家，可以说咖啡馆和酒吧是淮海路西餐业的主力。如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1933年10月易主盘于里亚林改名阿尔卡扎尔咖啡餐厅），不仅是上海开设较早的花园餐厅之一，其规模更居法租界之首，仅一个花园，即可置咖啡桌百余张；文艺复兴咖啡馆是俄侨聚会的沙龙；DD'S咖啡馆又为中外雅士汇聚处。<sup>15</sup>

DD'S咖啡馆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几家咖啡馆之一。该店由一个白俄开设，有着浓厚的法俄风味。所以很多白俄青年男女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DD'S当招待，DD'S在上海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它当时的具体门牌号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据说“霞飞路的DD'S，离兰心只不过一箭之遥，假使散戏颇早的话，不妨弯进去坐一下，再回家也不迟。这家罗宋作风很浓的咖啡馆，虽然还不至于像对过的卡夫卡斯那样门可罗雀，却今有兴美人迟暮之虞。楼下不如楼上，饮料平常，蛋糕特大，有种维也纳式的，甚好。”<sup>16</sup>DD'S咖啡馆有两层楼面，楼梯采用的是螺旋形。此外，从咖啡馆的大门设计和内部的建筑来看，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都呈有半圆拱形的结构，采用的是西式的建筑风格，呈现出气派、豪华、开阔的风格。另外，静安寺路上沙利文的斜对面也有一家“DD'S”。DD'S的环境是优雅的，情调颇佳，“惟饮品价昂，可可一杯竟需20余万元，好在前往者多为洋人，赚不了我们的法币也。”<sup>17</sup>不过即使这样，喜欢到那儿去休息一下、歇歇脚的仍是络绎不绝。因为他们喜欢“DD'S灯光布置的极为柔和优美，一片淡蓝色，或者紫红色，仿佛置身于迷离恍惚神秘小屋中。”<sup>18</sup>它的座位是沙发大库座，舒适异常，这里的常客又大多是些文质彬彬的外人，环境静悄悄的，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当时有人统计，酒店座上客以长衫先生为多，

<sup>10</sup> 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sup>11</sup> 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sup>12</sup> 徐迟等：《上海众生相》，上海新中国报社1942年版，第79页。

<sup>13</sup> 陶方宣：《张爱玲美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sup>14</sup> 石磊、楚焰辉：《老上海侨民生活》，第12页。

<sup>15</sup> 朱敏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名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sup>16</sup> 《今宵何处去》，《新民晚报》1947年2月28日，第3版。

<sup>17</sup> 《天上宴开东洋进宝》，《新民晚报》1948年3月16日，第4版。

<sup>18</sup> 英冬：《闲谈上海几个咖啡室》，《新民晚报》1948年3月31日，第3版。

百货店顾主，以摩登女士为多，咖啡馆则以成双作对者为多。<sup>19</sup>文人崔万秋也郑重其事地介绍道：DDS 是白俄经营的咖啡馆，设备完全欧洲式，桌椅整洁，室内播放着西洋音乐。咖啡也煮得香甜可口。上海的摩登人士多半喜欢到这里会朋友，楼梯作螺旋型，楼上供给罗宋大菜，晚间有白俄乐队，可以跳舞。<sup>20</sup>此外，DD' S 咖啡馆中设有两台吃角子老虎机，“去喝咖啡的客人都喜欢玩，虽然筹码被老虎机无声无息地吃掉，但是玩者依然是心甘情愿地被它吃掉身上的角子。”<sup>21</sup>演员顾也鲁日后回忆：“DDS 咖啡馆，这是霞飞路上有名的咖啡馆，在国泰电影院斜对面。话剧、电影界的演员如石挥、韩非、刘琼、吴茵和我，常去光顾。楼下是咖啡室，有两台摇银机（吃角子老虎机），去喝咖啡的客人都喜欢玩，此机一元可换十只筹码，有的会吐出几只筹码，多的会吐被吃掉了。传说机子里的角子会全部吐出来（英文叫“戛克堡”），那是玩此机者交好运了。但这只是听说，却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等奇迹，不然这机子就不叫是吃角子老虎机了。尽管如此，玩者依然是心甘情愿地被它吃掉身上的角子。”<sup>22</sup>

除了种种摩登玩意儿，歌舞表演也是 DD' S 咖啡馆的常备节目。1937 年 7 月，弟弟斯咖啡馆夜总会开业时，便曾邀请擅跳民风舞之著名女舞蹈家梅尔策 (Mel' tser, K) 献艺。时人称其集“美貌、非凡的芭蕾才华和完美无缺的舞技”于一身。她从不刻板地重复模仿，而是不断创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她的身材有如古希腊罗马雕像那样精美绝伦，充满温柔优美的女性特色。梅尔策的华尔兹特技舞使全场为之倾倒。而另一位女舞蹈家弗兰齐丝科 (Frantsisko) 的舞步亦十分火辣奔放。<sup>23</sup>DD' S 咖啡馆的音响设备也是相当高档，据一位老顾客郑汝德（郑逸梅的公子）回忆：“淮海中路（霞飞路）上的 DDS 咖啡馆在沪上颇有名气。在本市有两家 DDS 咖啡馆，另一家在南京西路（静安寺路），靠近茂名北路（慕尔鸣路），名声绝不亚于淮海路那家，因为这一家整天播放爵士乐、世界名曲，一只落地式电唱机，配了十二度低音喇叭（当时最好的音响设备了），吸引了无数青年男女，但档次都是高的。淮海路的 DDS 只喝咖啡，没音乐听，所以生意反而不如南京西路那家好。后者的女招待，雇佣了两名身材健美的俄国姑娘（直至五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外国女招待），她们不懂中文，好在一般常跑这里的大学生，简单英语总会说上几句的，也可以对付了。”<sup>24</sup>

咖啡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和新的社会关系生成了互动的图景。上海新兴的中产阶级，被纳入了咖啡馆所象征的西方消费主义的无形之手所编织的逻辑网络。随着咖啡馆文化的发展，咖啡馆的消费主义本质越来越浓烈，有的咖啡馆甚至为招揽顾客，内设了各种摩登新玩艺儿。比如著名的沙利文糖果店，就在其店内设有按摩电椅；纽约咖啡店，设有抽奖机等等。<sup>25</sup>在皇家咖啡馆中，则有灭火器及卫生医药设备等，太平门、卫生设备、电话等一切完备。此外，如 DD' S、卡夫卡斯、阿凯第、特卡琴科兄弟等咖啡馆还设有舞池。

这一时期的咖啡馆更多的是和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咖啡馆一方面是展现现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它也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为了实践中产阶级的文化理想，《申报》副刊《艺术界》专门开办了“咖啡座”栏目，

<sup>19</sup> 《上海点滴》，《新民晚报》1947 年 11 月 27 日，第 4 版。

<sup>20</sup> 余之：《摩登上海》，第 14 页。

<sup>21</sup> 余之：《岁月留情》，文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4 页。

<sup>22</sup> 余之：《风吹叶子》，文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4 页。

<sup>23</sup>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31 页。

<sup>24</sup> 余之：《风吹叶子》，第 64 页。

<sup>25</sup> 《申报本埠增刊》广告，1929 年 4 月 4 日。

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1928年8月8日，“咖啡座”栏目刊登了一则题为《上海咖啡》的广告。广告上说：“发现了我们所理想的乐园……在哪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sup>26</sup>曾留学法国的文人张若谷就经常与田汉、傅彦长、朱应鹏等几位友人在霞飞路上俄国人开设的巴尔干咖啡店内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笑风生，“从‘片菜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sup>27</sup>张若谷曾感喟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当时指1920年代后期）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文艺咖啡馆，他认为文艺咖啡馆是“现代都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一种设备”。<sup>28</sup>从上海现代性角度出发，认为“咖啡馆和电影院、汽车”一起成为城市生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他把咖啡馆放置在都市中产阶级市民生活的背景之下，总结出时人热衷于去咖啡馆的三种乐趣：（1）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亚于鸦片和酒”；（2）咖啡馆提供与朋友长谈的地方，“此乃人生之乐”；（3）咖啡馆里有动人的女侍。<sup>29</sup>虽然咖啡店里也有男侍，但来此消费的顾客似乎是更多是被咖啡馆内的女侍所吸引。在旧上海的咖啡店做侍女的一般有两种人：一类是洋女人，另一类则是中国女孩。洋女人中又以白俄女性为多，“对于霞飞路，多有名之曰罗宋街者。（罗宋即俄人之译音）此辈俄人率皆以营咖啡馆及杂货铺为业，而妇女则以充侍女舞女者为多。”<sup>30</sup>女侍应生也都服务周到，“沙利文咖啡馆的女侍应生也都彬彬有礼，训练有素。在咖啡馆中要一杯咖啡，泡上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服务员绝不会给你脸色看。”<sup>31</sup>此外，一些上档次的咖啡馆还规定侍应生要穿统一制服，如沙利文中的侍应女郎常年穿着绿白相间的裙式制服，天热时是布料，秋凉后则换成呢料。<sup>32</sup>甚至有白俄女侍应生在咖啡馆里觅得美满跨国姻缘的灰姑娘故事，如“上海泰晤士报云，俄女某，年二十八，系出名门，革命之前家产饶富。近数年内，尽失所有。一年前由哈尔滨来沪觅业，奔波数月，始于霞飞路某咖啡馆谋得一席，月入颇微，仅敷温饱。近有一男子，自南方来沪，小作盘桓，其人于商界居要职。某日与女遇，谈颇投机，无何，由友交而入恋爱，乃向女求婚”。<sup>33</sup>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女侍，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由此咖啡店既是性欲的活力空间，同时也是具形而上意味的，女侍在这里诱惑男性在咖啡和酒上消费，同时又扮演“他者”的角色。在咖啡馆内，权力的场域被性别化了，女侍取代了类似其他空间中的妓女角色。在咖啡馆内，知识分子不仅是在释放着多余的力必多（libido），同时也享受着性别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沉浸在咖啡香气中，发泄自己多余的荷尔蒙！

咖啡馆在30年代逐渐成为如舞厅一般充满着色情的意味。甚至引发当局下令禁止青年学生入内。如1934年，在新生活运动之下，“警视厅亦下令禁止学生入舞场与咖啡馆矣，其用意无非在预防青年实际生活上之恶影响耳。”<sup>34</sup>甚至有一些咖啡馆沦为赌博场所，如报纸载文称“俄国人维克多阿克门在愚园路一四〇九号万国咖啡馆秘密组设大赌窟，被捕房于本年二月十日下午十一时破获。因系

<sup>26</sup> 《革命广告》，《语丝》1928年第4卷第33期，第44—48页。

<sup>27</sup> 张若谷：《咖啡》，《申报》副刊《艺术界》，1927年11月4日，第22版。

<sup>28</sup> 同上。

<sup>29</sup> 张若谷：《现代都会生活象征》，载《咖啡座谈》，上海真善美书店1929年版，第3—8页。

<sup>30</sup> 《沪哈二埠白俄人之生活》，《申报》1929年9月3日，第21版。

<sup>31</sup> 董乐山：《在旧上海喝咖啡》，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sup>32</sup> 树菜：《豪门旧梦：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sup>33</sup> 《俄女良缘幸福》，《申报》1934年5月24日，第11版。

<sup>34</sup> 《禁止学生跳舞季》，《申报》“时评”，1934年12月23日，第6版。

越界筑路，故移送地方法院检察处。该维克多阿克门交一千元现金保，听候侦查。兹又查得当时在内与赌者有阿拉拿维同基（业新闻记者）、夏比罗（业跑街）、郭邱比（业掮客）、伯基（业音乐师）、白拉拿司（业跑街）、因向洛维司基（无业）。在第一特区法院时，曾幸交保故依法应一并归地方法院管理，经马检察官于下午开庭讯问结果各交五百铺保元听候核办，开已侦查完毕即将提起公诉。”<sup>35</sup>此外，咖啡馆也是一些秘密革命活动的开展场所。例如，潘汉年等中共特科人员选择在咖啡馆将从国民党内部获取的情报迅速地通知上级即江苏省委。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是通过剧社女演员蓝兰传达，他们经常约在“DDS”咖啡馆见面，潘汉年把密件交给蓝兰，由蓝兰托文委书记孙冶方上交，通过这种方式与上级保持联系。<sup>36</sup>另一事例则是，193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正式会见袁殊。此后，袁殊定期在法租界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作为接头地点。

即便政府始终希望通过各种社会渗透来规范、掌控如咖啡馆这类的公共场所。但咖啡馆仍然对学生、公司职员、知识分子独具吸引力。曹聚仁回忆道，“我是不爱喝咖啡的，这是土老儿的显明。因此，上海霞飞路上的巴黎情调，北四川路上的神秘风光，我都很少机会去领会。我的朋友，爱‘孵’咖啡馆的，说得诗一般风趣，我还是跟张老先生（天放），去‘孵’茶馆的好。张老先生，他倒是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带我上茶馆，日久成癖。他玩他的古董，我玩我的今董，各有所得，尽兴而归，且待别论。”<sup>37</sup>曹聚仁以土老儿自居，对咖啡馆持有明显的排斥态度，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茶馆品茶。而且还特意指出他的茶友乃是“海归”博士。言下之意，显然是鄙薄他那群爱“孵”咖啡馆的朋友们的洋派。曹氏的民族主义态度，是对咖啡馆所隐喻的西方殖民主义的自觉抗拒。然而，颇为有趣的是，在另一段史料中，曹聚仁则声称爱喝咖啡，前后判若两人，据他回忆：“喝咖啡，我们爱到国际饭店七楼的咖啡厅去，那儿，对着跑马厅，清风徐来，可以消暑，颇有坐香港半岛的味儿。”<sup>38</sup>

当时上海的咖啡店，俨然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生活方式的展示场所。因为，在路边行路的过路人，可以透过咖啡馆的沿街窗户窥见在咖啡馆内品尝咖啡的人们的悠闲与安适。上海的咖啡馆里大部分是火车座，布置得各有特色，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静。一开始，人们觉得奇怪，为什么里面的人都像在说情话一样窃窃私语，好像和中国人传统的社交场合——茶楼完全不同，冷清，没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其结果则是咖啡馆抢了茶楼的生意。幸好是在上海，如果换在内地，那咖啡馆就只能灰溜溜地来，也灰溜溜地走了。正因为咖啡馆情调幽雅、环境舒适，追逐时尚的上海人才会陆续从热热闹闹的茶楼走出来，又不约而同地踏进，安静的咖啡馆的大门。<sup>39</sup>在张若谷的《忒珈钦谷》一文中，作者写道：“坐在那里真觉得有趣得很，一只小方正行的桌子，上面摊着一方细小平贴的白布，一只小瓷窑瓶，插了两三支鲜艳馥香的花卉，从银制的器皿上的光彩中，隐约映现出旁座男女的玉容绰影，窗外走过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一队队在水门汀街沿上走过，这是每夜黄昏在霞飞路上常可看见的散步者，在上海就只有这一条马路上，夹道绿树荫里，有各种中上流的伴侣们，朋友们，

<sup>35</sup> 《俄人设赌窟侦查完毕提起公诉》，《申报》1937年3月10日，第17版。

<sup>36</sup>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sup>37</sup> 曹聚仁、曹雷、曹宪铺：《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sup>38</sup> 曹聚仁、曹雷、曹宪铺：《上海春秋》，第136页。

<sup>39</sup>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家族们，他们中间有法国人、俄国人，也有不少中国人，男的不戴帽子，女的也披着散乱的秀发，在这附近一带徘徊散步。……听不见车马的喧嚣，小贩的叫喊，又呼吸不到尘埃臭气，只有细微的风扇旋舞声，金属匙叉偶触磁杯的震声与一二句从楼上送下的钢琴乐音……”。<sup>40</sup>咖啡馆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的象征性空间。正如西方学者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所认为的，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sup>41</sup>就这一意义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对咖啡的消费是非常从众的。他们喜欢体验别人（西方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仅仅是洋人正在经历和喜欢某样东西的事实都会使上海的公司职员们对此趋之若鹜。

## 二 “空间的生产”与作为公共空间的咖啡馆

咖啡馆俨然还是个布迪厄所谓的“区隔”空间。有位老咖啡客回忆说，当年，他第一次走进光明咖啡馆（人民饭店的前身），进去就是红地毯，因为以前的皮鞋是硬皮底，一路走过，只听见皮鞋“咯吱咯吱”的声音，没有其他声响。就是这最初的印象，使老人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固执地把咖啡馆和“档次”、“品位”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确当时咖啡馆是比较高档的场所，满街的咖啡馆却不是满街的行人都能随便进入，进去的人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着装和举止。如果穿着背心和拖鞋贸然闯进去，那就别怪服务员不客气地把你请出去了。那时候去咖啡馆的中国人分几种，最多的是那些帮外国人做事的高级职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外企白领。他们多为外滩写字间里的职员，早上上班之前，先到南京路上的咖啡馆里小坐片刻，要一杯咖啡，烘好三明治，涂上果酱或黄油，吃两片再去上班。<sup>42</sup>再以赛维纳咖啡馆为例，该咖啡店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回力球场对门，抗战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宝气的洋女人，中国人是不去的。抗战后成了中国剧人进出的地方。进得店门是南北两行靠壁的火车座，经常在北首坐着重庆归来的游子，南首坐着上海的剧人，似乎这里存在泾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sup>43</sup>赛维纳咖啡馆设备简单，取价低廉，顾客也不多。当时以昆仑影片公司为主的不少电影工作者，还有画家、作家和诗人，据有几张固定的桌子往往从下午坐到晚上。<sup>44</sup>据文人冯亦代回忆，“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还有租界，南京路外滩一些大厦里，如堂皇豪华的汇中饭店和沙逊大厦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厦楼上的咖啡座等，原来中国人是进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代我们收回了租界，这些场所也为中国人开门了。”<sup>45</sup>这种心情显然颇为复杂微妙。

饮用咖啡也是有着其内在的门径，或者也可称之为“咖啡经”吧！据一位老咖啡客回忆说，“其他么、还可以喝法式咖啡、就是在咖啡中放小半勺的白兰地，如果放威士忌，就变成英格兰皇家咖啡、放入朗姆酒就是美国华盛顿咖啡，这些咖啡都带着酒香。”“喝咖啡还有个规矩，调羹不能放在杯子里，调好糖以后，调

<sup>40</sup> 张若谷：《忒珈钦谷》，《申报》副刊《艺术界》，1928年8月11日，重印于许道明、冯金牛编《张若谷集：异国情调》，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页。

<sup>41</sup> Douglas and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Routledge, 1996), pp.52-68.

<sup>42</sup>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第87页。

<sup>43</sup> 冯亦代：《洗尽铅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sup>44</sup> 解放日报社副刊编：《朝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sup>45</sup> 冯亦代：《洗尽铅华》，第79-80页。

羹要放在托盘上。”在老咖啡客的印象中，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似乎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学来的做派，“喝奶咖也有三步曲：咖啡上来，第一步不是喝，而是闻，闻闻它的香味怎么样。第二步放下咖啡杯、不放糖、不放奶要清的喝两口，品它的原汁原味。最后再放奶放糖喝。”<sup>46</sup>对咖啡之类的摩登玩意儿的讲究，某种程度上隐喻了一种身份的“区隔”，不仅区隔与都市内其他阶级，特别是作为城市下层阶级的如工人阶级、城市贫民等，同时也是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层次的区隔。

咖啡馆的选址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暗暗的与城市的区位定位相合。中产阶层市民对咖啡馆的品位消费不仅体现在饮用咖啡的技巧或者门道上。更加体现在到哪儿的咖啡馆去品尝咖啡。

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却良莠不齐。懂行的人都知道、上海的咖啡馆也是分区分段的。

第一段，外滩到河南路、这段是真正喝咖啡的地方、要求很高，咖啡馆里一般只选用两个牌子的咖啡、一个是 SW、另一个是 MIXWHE：RHOUSE。当年它们均属于美国的“王牌”咖啡、咖啡豆先要炒、炒出来之后用酒磨、然后再烧，来这段喝咖啡的才是品尝咖啡。

第二段，河南路到黄陂路，这段路属热闹地段，四大公司汇集于此、再加上大光明电影院，所以喝咖啡的对象就不一样了，是一些“白相”人。有的来逛马路、买东西，累了，投个咖啡馆歇歇脚：有的去电影院看戏、时间没到，所以喝一杯，总体来说比较随便。

第三段，成都路到静安寺附近，这一段外国人比较多、咖啡馆也很集中、多是一批写字楼的白领来吃早点、喝下午茶。<sup>47</sup>

对于咖啡馆所透露的中产阶层文化品位。在知识阶层中也是持有不同的看法与态度的。譬如鲁迅对位于北四川路的号称“革命咖啡馆”的批判语调甚是辛辣、不遗余力。据具体经办这家咖啡馆的饶鸿竞回忆，咖啡馆开张后去喝咖啡的人很多。<sup>48</sup>鲁迅写道：“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齷齪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sup>49</sup>他继续辛辣、甚至于有些尖酸刻薄的讽刺道：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

但我又有几句声明——

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

<sup>46</sup>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第 88 页。

<sup>47</sup>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第 86 页。

<sup>48</sup> 饶鸿竞：《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版，第 915 页。

<sup>49</sup> 鲁迅：《革命咖啡馆》，余之、程新国编：《旧上海风情录（上）》，文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褻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sup>50</sup>

鲁迅对革命咖啡馆内左联革命知识分子辛辣的讽刺，尤其体现在对无产阶级咖啡这一用词的强调。在鲁迅看来，这些左翼文人，在咖啡馆内聚会，畅谈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左翼知识分子欣赏、享受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咖啡馆这一客体，将上海的殖民现代性对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拙劣模仿一一呈现、表露无疑。在鲁迅看来，品尝咖啡的文化意义及透过其外观所传达的象征取向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如此不协调。上海咖啡馆虽然名为革命咖啡馆，但其西方内涵乃至强烈的排拒性的社群意识却是毋庸置疑的，明显是和作为咖啡消费者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背道而驰。而远处的许许多多他们真正应该关心的“齷齪的农工大众”，则只是作为背景虚置在左翼知识分子自我编织的都市图景中，将工农革命和它真正的社会根基切割开来。为了表达对这种矫揉造作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和殖民现代性的不满与抗拒。与曹聚仁一样，鲁迅本人也基本上只饮茶，而且还只是绿茶。鲁迅自己也不时地谈到：“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的。”<sup>51</sup>在鲁迅对饮用中国绿茶还是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咖啡的取舍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茶和咖啡的矛盾和两难态度。鲁迅对咖啡（西方）的排斥和对绿茶（中国）的青睐，不再仅仅只是导因于个人的喜好，而更表达知识精英在遭遇作为“它者”的西方文化时，面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伦理价值在西方冲击下的消解过程，自觉地固守着个体对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与义务。然而，在其他史料中也可发现，鲁迅也不是完全排斥咖啡馆，相反他经常和一些左翼文学青年在此碰头见面。譬如鲁迅也经常约一些文学青年在四川北路的白俄咖啡馆中见面。白俄咖啡馆离鲁迅寓所和内山书店很近。1930年6月5日，鲁迅约柔石在此见面；1932年12月，葛琴和几位朋友在内山书店渴见鲁迅，为方便谈话，鲁迅同他们一起到此咖啡馆谈心。1934年，鲁迅和许广平约萧红到这家咖啡馆见面。

而从另一层面而言，鲁迅在五四时期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在1930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舞厅、公园、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显然，鲁迅在上海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不仅仅限于空间的生产。在诸如咖啡馆这样的现代事物中，不惮于前行的猛士总能在上海租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发现一种“半殖民性”。上海社会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性”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透过这些表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

现在看来，鲁迅对咖啡馆的排斥不免有着时代的误会。1927-1929年间，鲁

<sup>50</sup> 鲁迅：《革命咖啡馆》，余之、程新国编：《旧上海风情录（上）》，第5-6页。

<sup>51</sup>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63页。

迅与左翼文学群体对“革命”的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围绕着对革命的不同理解，位于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成为了讨论这些政治话题的理想场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左联”正式成立之前的多次筹备会议均在公啡咖啡馆中进行。据夏衍回忆，“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两次，有时隔两三天，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sup>52</sup> 1930年2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中，也曾有“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的记载。<sup>53</sup>救国会的一次小组会议则选在沙利文咖啡馆中秘密进行，会上讨论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沙利文咖啡馆是“上海相当华贵而享有盛名的消遣场所，取价也高，每当中午和下午三四点，寓沪外侨和所谓一般高等华人，拥拥挤挤地都到该处去吃饭喝茶喝咖啡或冰淇淋。”<sup>54</sup>沙利文咖啡馆是上海档次较高的消遣场所，救国会小组择定在该处开会颇能出其不意，有掩护作用。而有些左翼作家甚至将咖啡馆作为工作室兼会客室使用，如冯亦代就回忆“夏衍老人住在静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里，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馆。我当时在办一张《世界晨报》，有事请教，就都在这家店里；我把这里称作夏老的会客室。这家咖啡馆有个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柜台上现煮现卖的，煮时清香满室，一楼蓝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里格外夺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时夏衍老人就在卡位里写他脍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动派头痛万分。”<sup>55</sup>同样地，环境优雅的DD'S因为有着浓厚的法俄风情，所以也像巴黎的咖啡馆一样，吸引了许多文艺界人士。文人骚客是这里的座上宾，甚至有许多人在这里有固定的专座。例如在1947年3月4日，“田汉五十寿辰庆祝筹备会，定于本日下午三时于霞飞路弟弟斯咖啡馆举行。”这样的事情不是唯一的个案，应该还有很多此类事例。不少作家因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很狭小（事实上他们大多住在牢笼似的亭子间里，所以又被称为“亭子间”作家），再加上里弄里的喧闹给写作的干扰而不厌其烦，被迫逃到咖啡馆里求个清静的写作环境。<sup>56</sup>

正如著名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在论述近代上海发展时说：“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sup>57</sup>咖啡馆本身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此无疑是抱着相当矛盾的微妙心理。一方面，咖啡馆隐喻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象征着作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似乎是与民族解放、革命理想根本对立的。然而，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却通过进入咖啡馆内饮咖啡，获得了具体真切地现代性体验与感官愉悦。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内的体验和经历提供某种得以被“理解”（或误解）的“认知框架”、得以被表达的“话语模式”。

一位作家也在30年代回忆起上海咖啡馆的兴起过程。据他回忆，上海专门的咖啡馆大概初创于“民国十七、八年间的的事情来。最初和咖啡结不解缘的，恐怕还得数中国的一部分新文艺作家。”那时咖啡馆在上海还是绝无仅有，“就在普罗文学刚在中国抬头的民国17年那一年，不知什么人灵机一动，竟在号称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开设了上海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家咖啡馆，招牌名叫‘上海

<sup>52</sup>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sup>53</sup> 鲁迅：《日记十九》，《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sup>54</sup> 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sup>55</sup> 冯亦代：《洗尽铅华》，第78页。

<sup>56</sup> 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下册，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6页。

<sup>57</sup> 【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珈王非’，从咖啡二字写成珈王非这一点上看，就可知道那时喝咖啡的风气在上海还没有普遍。这第一家咖啡馆倒也能开风气之先，在里面还雇用着女招待，因此引得一般多情敏感的新文艺作家趋之若鹜，大家都想到这里来获一些‘烟士披里纯’，尤其是一般普罗文作家如蒋光慈、叶灵凤等，更是每天必到的，甚至还不知不觉把他们从咖啡馆得来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写进他们的所谓普罗文学作品里去，成为反对普罗文学作家们冷嘲热讽的反攻资料。”<sup>58</sup>从中可知，早期的咖啡馆的确是与一班文化人和作家有关。作家与咖啡馆的结缘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尤盛于法国巴黎等地。

可惜的是，这两家咖啡馆在上海据说是最早出现的（事实上则不然），但都宛似昙花一现，很快地销声匿迹了。而到了30年代中后期，咖啡馆与当年文人骚客的聚集之所已大不相同了，即作者所谓“往日如鲁殿灵光昙花一现的咖啡馆，到了现在，竟会风起云涌的盛极一时，不过今日的咖啡馆，文艺气息已经丝毫没有，充塞其间的也都是凡夫俗子，暴发户之流；而乐队，女歌手、舞蹈等。直与坐咖啡馆的宗旨背道而驰。”<sup>59</sup>由此看来，也说明了咖啡馆顾客群体的扩大，已然成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广大市民都乐于惠顾的娱乐场所。

## 余论

总体而言，咖啡馆与日渐兴起的杂志和电影院一道成为了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样板，一种西方化的科学健康和合理的生活习惯的模范，一种根植于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洋世界”和“土世界”的对立二分，并自我意识到现代性并试图与所谓愚昧、迷信和落后的乡村社会区隔开的消费方式的范本。同时，也要注意，咖啡馆与电影院这类流行的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其本身的经营也和公共事务一样，要依赖于大众的参与，而且也是制造公众的空间。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方面。”“对生产的分析现实我们已经由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sup>60</sup>列斐伏尔尝试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三个向度来探讨空间生产的问题。

上海巨大的欧式建筑和20世纪上半叶修建的砖头道路反映了这个城市曾经与世界的大融合。这些地方不断地提醒着人们，老上海的建设缺少整体的规划布局——但其魅力经久不衰。公园、电影院、咖啡馆等新型公共休闲空间的涌现，为近代都市人（如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与日常公共性的展示舞台。时人如此赞誉当日上海之世界性都市图景：

今有人焉，游踪所至，忽抵上海，耳目之所接触，不啻身入欧美都市也，楼阁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乐部之伟丽，游览之处，则公园及大桥在焉，交通之具，则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备焉，洋商林立，电

<sup>58</sup> 史谭：《文艺咖啡》，杨斌华编《上海味道》，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另关于此处叙述中称这两所咖啡馆是上海最早的专门咖啡馆，似与前文中《上海指南》一处有冲突，仍以1917年《上海指南》记载为准。疑为作者信息有误。

<sup>59</sup> 史谭：《文艺咖啡》，杨斌华编《上海味道》，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sup>60</sup> Henri Lefebvre,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W.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炬灿烂，凡此皆在欧美所习见者。<sup>61</sup>

作家陈西滢也对上海的诸娱乐空间在物质层面给予的舒适感和娱乐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再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的附近去走一回，就可以看见无数的宽敞的花园，精致的别墅，住在里面的舒服，……再走到南京路，极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一连就有三个，其余的中国的，外洋的种种色色的衣食杂用的商铺，五光十色，叫人眼睛都看得晕花。此外有的是戏园、电戏、咖啡馆、跳舞场、公娼、私娼、赌场、烟窟，以及种种说不出，想不出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样，娱乐的场所。……<sup>62</sup>

咖啡馆、电影院、公园等公共空间的涌现，展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大众”（mass，群众）的登场。甚而可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公共性的不同发展路径。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只有私人空间和官家的空间。在咖啡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却是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平等权利，都应受到尊重的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内，刚刚脱离乡村生活的都市人体验了以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这种现代休闲生活在工业化时代满足了人们在一天朝九晚五工作之后渴望放松的需求。在都市家庭私人领域之外，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凭借这类公共空间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人们荡涤往昔的陈见，更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城市生活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启蒙式的更为敏锐、更为灵通的公众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空间内，人们可以和邂逅的陌生人保持丰富多变的“弱联系”，空间的开放性使他们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更好的参与公共生活，融入新的都市共同体内，从而在注重私德的家庭空间之外，逐渐培育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共人格”（public person）。<sup>63</sup>于是，咖啡馆不仅仅是休闲场所，为了让人消磨时光并且逃离原本辛苦的工作和生意的放松场所。而是一个有结构的严肃的社交场合，这个结构尽管有限，但是具有相当的弹性。与茶馆不同，咖啡馆代表了日渐兴起的专业精英的志趣，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娱乐休闲方式，反映了城市社会一个重大的社会分化，这一分化的本质和意义尚需要更多的分析。进而言之，对社团和公共空间的催化作用是咖啡馆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贡献。现代都市生活的本质是市民的扩大，是启蒙了的大众的出现，是大众社会的形成。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近代社会的公众从这些社交场合中成形，并认为公众只是对咖啡馆这个核心的扩展，因此也定下了“公众”的基调。

同时也要看到，透过咖啡馆这一微小的公共空间的历史叙述可以知道，不能简单地将民国社会描绘成玫瑰色的上海摩登，在1949年之前，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官僚和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艰难成长的。所以即使是在上海这样非常现代（摩登）的工商业城市，也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多看到的是具有“小市民”性格的上海中产阶级人群。尽管他们的现代性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讲规则、讲理性、崇拜西方。但是，最终在近代上海，“大众”的秩序妨碍了向成熟化、负责任的“市民社会”迈进的苗头。

<sup>61</sup> 【美】卜舛济著：《上海租界史略》，岑德彰编译，上海勤业印刷所1931年版，第1页。

<sup>62</sup> 陈西滢：《西滢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sup>63</sup> 这种“公共人格”作为一种普遍的尝试的体现。此处的“常识”回归到它的拉丁文意义——“社群的通感”（sensus commune）。